

# 从中韩国际婚姻看跨国民族的认同困惑

——以在韩朝鲜族女性为个案研究——

全信子 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摘要】**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随着频繁的跨国人口流动以及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使得每个人由于所处情境的不同，由此派生出多重身份认同，甚至因为多重的群体身份认同而产生了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中国朝鲜族女性在中韩跨国婚姻中的民族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之互动，也从某一个侧面表明了这种多重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及其现实困惑。本文通过中国朝鲜族移民的跨国通婚研究，试图深入了解跨国民族的多重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不同的角度认识人类群体的本性，而且也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跨国民族概念的丰富内涵，从而探讨如何促进中国朝鲜族移民群体处理好所在国与母国的和平跨居、友好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 跨国通婚、朝鲜族、女性、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多重认同

## 一、缘起

人类有着特有的群集性属性，这种群集性通常有地域的、政治的、经济的、职业的、宗教的等等不同性质的群体归属，由此便自然地产生种种复杂的身份以及群体认同问题。“民族”或“族群”通常也是人类群体归属的一种，因而民族认同也是人类“群体类分”的方式之一。

从历史上看，民族可由两条不同的路径形成，一是与血缘文化相关的人群集合，即属于一个在血统和文化上的人群（他们可能不居住在一起）分享着一样的团结感，因而组成一个民族；一是与血缘无关，但与政治和政治认同有关的不同族群和语言集团的人们，由于分享着同样的团结感而组成一个民族<sup>①</sup>。由于以上民族形成的不同路径，就导致了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的区分。而跨国民族的存在，正是因为具有同一文化源流，如果没有这个同源文化的前提，“跨国民族”无从谈起。因此，在谈论跨国民族时，不能以政治民族认同为尺度，只能以文化民族认同为标准。

跨国民族具有民族的一般特征，在族源、语言、文化等方面具有共同性，但它与一般的民族概念比较，又有着特殊性。是一种特殊的民族存在形式，这种特殊性的关键在于，跨国民族是被国家界限分割的同一文化民族，他们不仅不具有共同的地域和民族心理素质方面的共同国家认同观念，而且往往也不具有一体化的经济生产联系，这条人为的领土和政治界限客观上妨碍了同一文化民族的经济文化交往。实际上，跨国民族是一个文化民族的概念，其根本内涵是不同国家认同的人们，有着内在的民族文化联系<sup>②</sup>。也就是说，跨国民族具有不可分割的三层内容，其一为同源性，其二为共同的文化特征，其三具有共同的族属认同和民族感情。<sup>③</sup>

中国朝鲜族作为跨国民族，迁入中国数百年，已形成了有别于朝鲜半岛的民族共同体，即中华民族的一员，有明确的国家认同和归属，但朝鲜半岛文化上的共性使他们成为跨国民族。改革开放后，尤其是中韩建交，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深入，人际交往日益频繁，两国间的国际婚姻十分盛行。本文通过中韩国际婚姻中朝鲜族女性的认同困惑，旨在探索跨国民族的多重认同及内涵，为“和平跨居”的模式，提供可借鉴的资料。

<sup>①</sup> 周建新主编《民族学 人类学》2002年卷 广西民族出版社。2003年 2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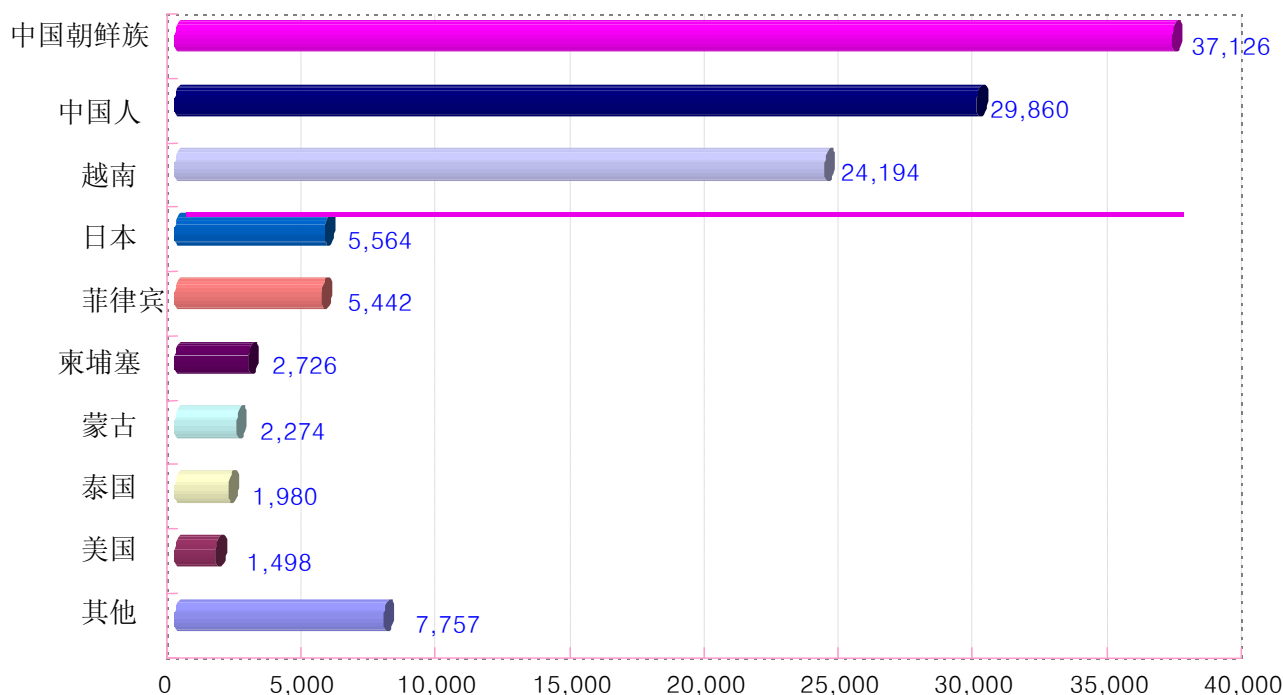
<sup>②</sup> 周建新著：《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265页。

<sup>③</sup> 参照马曼丽等著：《中国西北跨国民族文化变异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

## 二、 中韩国际婚姻中的民族文化认同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 1992 年中韩正式建交，中国朝鲜族与其母国韩国断绝近半个世纪的壁垒，终于被冲破，经济、文化交流及人际往来日益频繁，两国间的国际婚姻十分盛行。从 1990 年到现在为止，数万多朝鲜族女性嫁给韩国男性，在韩国国际婚姻中名列第一。

如表<sup>①</sup>：



如图所示的领先数字，已表明中韩国际婚姻的盛状。就其盛行原因而言，有多种外部因素，如注重配偶的环境因素，经济因素及“连带效应”<sup>②</sup>等，但其内因则是内在的文化联系与民族文化认同。文化是民族存在的基础，也是民族认同存在的根基。这一特点使得民族认同比其他认同有着更为持久的聚合力。

随着中韩两国人际交流的日益频繁，韩国文化的不断传入，唤起了中国朝鲜族对同源同根文化的追忆，回归和认同，朝鲜族很多已丧失的文化，重新得以恢复。文化上的同根同源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民族相同、语言相通、有共同的文化背景，不但方便了交流和沟通，而且还增加了相互之间的信任程度，从而有利于投入的资本更好地发挥效能。<sup>③</sup>由于朝鲜族大部分都与韩国有一种特殊的因缘，所以与韩国人往来和交往时，得到不少关爱，加上朝鲜族文化起源于朝鲜半岛，与韩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上有一种认同意识，这便成为朝鲜族女性在国际婚姻中首选韩国男性的内在因素。如：

**个案：**韩国京畿道城南市李女士访谈录：

<sup>①</sup> 韩国出入管理局外国人政策本部：2008 年 9 月 30 日

<sup>②</sup> “连带效应”是指通过缔结国际婚姻女方父母不花其他费用，便可以邀请到韩国。现改为其他亲属也可以被邀请。中韩两国正式建交，并不意味朝鲜族自由出入韩国，因此，对不具有出国条件的人来讲，这是一个实现出国的一种最佳途径。

<sup>③</sup> 李文. 东亚合作的文化成因.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年. 第 6 页.

我选择韩国男性虽然也有一些经济因素，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文化相同，语言交流无障碍，无陌生感，因我们毕竟是同一个祖先嘛。我的姑姑及伯伯都是韩国人，我们家族的发达都与他们的关照直接相关，我们有血缘关系自然就比较亲，当他们把韩国男性介绍给我时，我觉得很有亲近感和熟知感，不觉得他是一个外国人<sup>①</sup>。

个案：韩国京畿道城南市安女士访谈录：

我与韩国配偶交往，感情发展很快。也许是语言相通，文化相似，没有陌生感的缘故吧，未见几次面，就感到很亲切，很熟知。因此，选择韩国男性心里没有什么负担。经济条件再好，如果语言不同，生活习惯差异太大，婚姻缔结的系数会是很低的。<sup>②</sup>

个案：韩国首尔市东大门区吴女士访谈录：

我和现在的丈夫初次相见，就没有感到他是异国人，说不同嘛，就是他比我知道的多，也就是说比我有学问，言谈举止都很得体，可以说我是一见钟情的。在交往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韩国传统文化。比如中国朝鲜族虽然饮食文化和韩国差不多，但仍有区别。腌泡菜、做酱汤等在韩国都是有程序、有讲究的，可中国朝鲜族饮食相比起来就比较逊色了。<sup>③</sup>

个案：韩国首尔市九老区孙女士访谈录：

我虽然是中国公民，但嫁往韩国时，不知为什么没有把韩国当作异国看待，因为我的爷爷奶奶的坟地至今在韩国的庆尚道，我的同父异母的姐姐也在韩国，据说韩国还有我父亲的户籍。伪满时期，我父亲只身一人来中国谋生，1945年朝鲜半岛南北分裂后再也没有回去。我亲眼目睹过父亲思念韩国亲人而流泪的情景，这种情结难以忘怀，正

---

<sup>①</sup> 李女士 54 岁。京畿道城南市。2005 年 10 月 28 日访谈。

<sup>②</sup> 安女士 52 岁。京畿道城南市。2005 年 5 月 5 日访谈。

<sup>③</sup> 中国朝鲜族女性访谈，吴女士，30 岁，2005 年 5 月 6 日，首尔市恩平区 MEKA 写字楼。

巧，被介绍的韩国男性正好又是父亲的家乡人，更感到格外地亲切和熟知，所以两人的话题就更多了。<sup>①</sup>

以上个案从不同程度和角度表明朝鲜族女性在与韩国男性交往过程中，更多的强调与其的共性，没有文化上的陌生感及由此带来的不便，有其认同感。这种认同来自于民族对固有的习俗和传统而产生的归属感，其主要动机就是在自我和他者之间作出的区别。所以文化认同被理解成民族对于其本身的传统而生发的一种内在情结（complex）<sup>②</sup>。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可以反映人们对以文化联系起来的群体归属，即自己属于哪一个民族，认同民族的文化，从而带来了相互之间的亲近感。由于中韩两国之间近半个多世纪断绝往来，改革开放后，尤其是中韩建交，使两国近半个世纪的森严壁垒被冲垮，同源传统文化的熟知必然引起共鸣，加上“汉江奇迹”的诱感力，一并促进了中韩国际婚姻的飞速发展。

### 三、 中韩国际婚姻中的文化差异与认同困惑

在中韩国际婚姻中，朝鲜族女性与韩国男性交往，以民族文化认同为先，没有把韩国男性看作异国人，语言相同，风俗相似，“同族同胞”的认同，拉近了双方的距离和感情，跨越了国界和国家归属的屏障，因此，国际成婚率高、人员多及速度快。绝大多数朝鲜族女性婚姻移民到韩国，取得韩国国籍，成为韩国公民。但在实际婚姻生活中，由于中韩两国体制差异，成长背景差异，文化差异，一直困惑着朝鲜族女性。面对所谓的“同族同胞”，面对自己觉得十分熟悉的文化，出现了“文化震撼”。

#### （一） 语言文化差异

差异，是指形式或内容上的不同。这个概念通常使我们联系一些相关的词语——分类、归类、类别及比较等。在中韩国际婚姻中，首先面临的就是语言差异。

语言是交流感情的工具，是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必须依赖语言来传达大多数文化要素，有了共同语言，成员才能互相沟通，语言是普世文化，但相同的语言使用，在不同国家亦有显著不同。朝鲜族女性与韩国男性都是使用相同的语言，但由于国家不同，语言使用有很多差异。因为朝鲜语和韩国语都是由固有词、汉字词和外来词三种要素组成。韩国人在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同时，更多地引用外来语，即英语。而朝鲜族在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同时，更多地引用汉语，因此翻译时常常把汉语直译成朝鲜语。不仅如此，有些词的用法其本意和引申意不同。朝鲜族女性在韩国语的使用上，有一个误区，只认为韩国语的语调与朝鲜语不同，所以注重语调的强化练习，而对其语言的固定用法和习惯用法却不大重视，她们初到韩国时，无法将韩国语言流利上口，不仅是声调，而且在用词上不得当，俩人沟通时便产生误解。

**个案：**京畿道城南市严女士访谈录：

我和丈夫是通过一个朋友介绍而结婚的，俩人相处得比较好。但没想到因语言差异，差一点分手。那是因为他喝酒的频率比较高，回来时我就唠叨没完。他说都是为了生意让我多理解，我想这只是一个借口就更没完没了的说他。我说如果不是因为跟你有感情我才不这么唠叨呢。他说有什么感情？你就直说吧。当时我很奇怪，有感情是一件好事，

<sup>①</sup> 中国朝鲜族女性访谈，孙女士，45岁，2005年9月19日，首尔市九老区新兴洞

<sup>②</sup> 雷勇. 论跨界民族认同的多重性.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8年第4期

为什么他会发这么大的火？我越想越生气，他到底怎么了？那一天我们彼此都非常生气。等到第二天，他心平气和地跟我说：你对我有什么感情就说吧，放在心里反而会增加我们之间的不愉快。这时我才觉得说的话不对劲，便问道感情这句话是好意你为什么这么问。就这样我们相互之间围绕着“感情”两字说起来。原来韩国人对谁有成见的话，就说有什么“感情”，这里的“感情”指的是一种成见，而真正的感情只说成“情”。这一场误会，我至今难以忘怀。同样的语言，使用上竟然有这么大的差异，我真是没有想到。<sup>①</sup>

就“感情”而言，中韩的解释不同。中国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一是对外界刺激的比较强烈的心理反映；二是对人或事物关切、喜爱的心情”。而韩国语词典的解释是：“一为对事物感受引发的心情，二为对快与不快为中心意识的主观侧面。”韩国人所使用的“感情”其实是语音发音上的“憾情”；即因不满和怨恨生气的心情。这种差异往往产生误会，类似这样的语言差异给朝鲜族女性带来了诸多麻烦。

## （二）风俗习惯差异

不同的国情民风，社会环境，使得朝鲜族女性在价值观念、待人接物及生活习惯上，常出现文化失调现象。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之喜好，一般日常家务的处理，韩国文化对媳妇角色的要求，生活中的节庆习俗，风俗禁忌等，都可能带来文化上的冲突。

个案：首尔东大门区吴女士访谈录：

我们在中国也有祭祀仪式，当自己的长辈也就是说祖父母辈或父母辈去世，连续三年进行祭祀。现在有的地区简化成两年，仪式也比较简单。但在韩国这种祭祀祖先的礼仪年年举行。不仅如此，春节和中秋要搞茶礼，去世的日子要搞祭礼，每个家庭每年至少三次，多则十几次。<sup>②</sup>

个案：京畿道君浦市崔女士访谈录：

我和我的先生是自由恋爱结婚的，他是一个大学生，有知识，通情达理，人又厚道。他什么事情基本上都依我。可有一点必须听他的，那就是祭祀祖先的事。他是家族的长子，身下有两个兄妹，父母经济生活也比较好，可以说我们挣钱我们花。但一年之中的祖先祭祀必须由我来准备，平时不做饭，他不指责你，可是祭祀礼仪要准备不好，那可

<sup>①</sup> 严女士 32 岁。京畿道城南市玫瑰村现代 836 洞楼。2005 年 10 月 1 日访谈。

<sup>②</sup> 吴女士 29 岁。首尔恩平区碌番 MEKA 写字楼 716 室。2005 年 4 月 3 日访谈。

不得了。按他的话说，只要祭祀准备得好，一年不做饭不洗衣也无所谓。<sup>①</sup>

**个案：**京畿道安山市车女士访谈录：

我嫁到韩国两年期间被丈夫打了 5、6 次，原因很简单。每次都是说我与她顶嘴，“作为妻子胆敢反抗丈夫，实在不成体统”。其实，好多事情，并不是我不尊重他与他吵架，而是与他辨明理由，但在他看来妻子就应该默默无闻，百依百顺于他，只要辨明，那就意味着反抗，就向你行使暴力<sup>②</sup>。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很多移民女性受到家庭暴力的原因之一就是与丈夫“顶嘴”。当然这种暴力的起因多种多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家长制传统伦理规范，使女性总是要服从于男性，百依百顺，不得反抗。

### （三）社会体制的差异

众所周知，中国与韩国是两种不同体制、不同社会属性的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是与周围世界和事物的普遍联系中存在和发展着的。在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中，在周围环境和条件的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它也会呈现出多维属性。即为民族自然属性、社会属性、民族生物属性。中国朝鲜族与韩民族在自然属性和生物属性上基本相同，但社会属性各异。也就是说朝鲜族女性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引进市场经济机制，社会开始转型。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并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改变的，尤其是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残余仍然不同程度地左右着朝鲜族女性的思想。

而韩国是资本主义体制社会，政治上多党制和民主化，经济上多种所有制并存。在韩国社会内，最重要的价值及规范原理之一就是传统儒教伦理为基础的家族主义和其派生出的权威主义。现在韩国社会家族主义，对社会组织内的所有事项的决定，仍具有绝对的影响力。再则，就是组织内重视上下级垂直的等级秩序的权威主义，不仅如此，如男尊女卑，士农工商的性差别和身份意识，又对儒教的等级秩序的正当化，起到了价值体系的作用。

**个案：**首尔市西大门区林女士访谈录：

我们在中国，单位也好，家庭也好没有什么严格的等级规范。尤其是职业女性，同男性一样从事工作，在家里也比较平等，走上社会所受的教育就是女人是半边天，十分强调女性的地位和权利。单位上下级随便开玩笑，没有什么界限，可韩国就不同，阶层

---

<sup>①</sup> 崔女士 31 岁。京畿道君浦市。2005 年 6 月 12 日访谈。

<sup>②</sup> 车女士 40 岁。京畿道安山市。2005 年 10 月 10 日访谈。

划分十分明显，一见顶头上司，毕恭毕敬，真的难以适应。<sup>①</sup>

**个案：**在首尔市九老区生活了近六年的崔女士说：

我到韩国后才真正感到我们朝鲜族与韩国人是两个不同国家的人，绝对不是一个民族。

以前我总觉得，语言相通，民族同源，谈不上什么适应问题，但这是一个错误。我们与他们的文化差异很大，适应起来并不是容易的。你如果真的想在韩国立住脚，那么就要适应这里的文化，首先，你的言语声调和词汇的用法就要向首尔看齐，不要在语言上留一点朝鲜族的痕迹，其次，你是一个女人就得有一个女人样，说话要轻声细语，在家就得顺从丈夫，他说什么你就应什么；在工作单位就得唯命是从，尤其是对上司，你必须唯唯诺诺，彬彬有礼。

如果像在中国那样同志式的相处，准得走人。<sup>②</sup>

以上个案所表述的差异，常常会带来冲突，给朝鲜族女性很大的困惑。因为她们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走向社会，开始了职业的生涯。而这个过程都是在国家和政府的关照下进行的。由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她们从事工作没有更多的后顾之忧，统一劳动，统一分配。并在社会主义的理念下，形成了比较单一的思想模式，“公共”性的教育多，单位上下级关系，家庭中的夫妇关系等是同志关系，没有严格的等级观念。这与韩国女性从小所受到的家庭儒教文化教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同类型、不同模式的文化价值观念是非常悬殊的，即使是同一文化类型内部，也有不同的群体文化意识。更何况中韩两国是不同体制的国家，价值准则、风俗习惯、社会制度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朝鲜族女性对自己的选择感到困惑，抵牾、彷徨，认同意识出现了巨大落差。她们从兴奋期，进入观望期，冲突期，适应期，艰难地适应着韩国文化。

#### 四、 中韩国际婚姻中的国家认同

婚姻移民的朝鲜族女性嫁到韩国并取得了韩国国籍，但也难以把韩国当作自己的国家。正如笔者在一次采访中所见：一位婚姻移民女性说，“你如果搞国际婚姻调查要注意的第一点就是我们中国朝鲜族和韩国人是属于不同国家的两国人”<sup>③</sup>。这本来是很清楚和明了的客观事实，但她如此强调，说明在与韩国男性交往时以民族文化认同为先，民族文化认同为重，忽略了国家认同。但到了韩国后由于一系列的差异引发的文化冲突，使她们的认同出现了困惑和重大的转折。

朝鲜族是一个跨国民族，虽然与韩国具有历史文化源流认同上的一致性，但这种历史文化上的一致性随着政治上的多样性的不断发展，尤其在现代主权国家下，成为有别于朝鲜半岛的朝鲜民族，成为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朝鲜族，具有明确的国家认同。她们深深感到自己和韩国人的确属于不同国度的异国人。再则，朝鲜族女性即使取得了

<sup>①</sup> 林女士 54 岁。首尔市西大门区。2005 年 5 月 23 日访谈。

<sup>②</sup> 中国朝鲜族女性访谈录。崔女士 52 岁。首尔市九老区。2005 年 10 月 25 日。

<sup>③</sup> 中国朝鲜族访谈录：崔女士，2005 年 10 月 25 日，朝鲜族教会。

韩国国籍，但是对中国的国家认同意识没有变化。她们来到韩国，深切体会到自己的第一个身份是中国人，其次才是朝鲜族，具有明确而牢固的国家认同意识。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主权等的认同，即国民认同<sup>①</sup>。

那么为什么中国朝鲜族会具有十分清楚和坚定的国家认同意识呢？这就是中国朝鲜族迁入中国东北以后，在数百年的漫长历史长河中，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经历了与韩国不同的社会形态。朝鲜族在迁入初期，与封建的清朝政府进行斗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时，与兄弟民族一道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驱逐了日本侵略者；在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匪残余势力进行英勇的斗争，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1952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成立，更加确立了朝鲜族人民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当家作主的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具有了共同语言、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中心的共同地域、水稻农业为主的共同经济生活及表现在共同民族文化上的共同的民族心理形成了中国少数民族之一的朝鲜族共同体。

中国朝鲜族文化是在吸收汉文化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后，在具有中国世界观的同时，保持朝鲜半岛的生活文化和语言，把中国和朝鲜半岛两种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朝鲜族是在以社会主义理念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是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之一。跨国民族是研究朝鲜族的前提条件。因此，“中国的世界观”，“中国文化”，“社会主义理念”，“少数民族”，“跨国民族”等特征都是朝鲜族文化有别于韩国文化的不同之处。

因此，嫁到韩国的朝鲜族女性尽管取得了韩国国籍，形式上已成为韩国公民，但她们对韩国的国家认同并未提升，反而更偏重于中国。除了上述的历史原因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来自韩国社会的偏见和差别待遇。

中国朝鲜族女性的国际婚姻，模式多样难以一言概之，但不可忽视的是具有“商品化”性质的婚姻模式，即“假结婚”者，人数之多难以统计。基于这种现象，朝鲜族婚姻移民女性在韩国可谓“污名化”的“贴标签”，负面的刻板印象化。

首先，朝鲜族女性来韩国的目的就是为挣钱，取得国籍就会逃走。再则，就是清一色地认为朝鲜族女性的婚姻都是“假结婚”。尤其新闻媒体对于朝鲜族婚姻移民的诸多带有偏见的报道，更助长了这种负面认识。她们在家得不到信任，在社会得不到认可。

**个案：**京畿道安养市的韩女士说：

我结婚8年，孩子都三岁了，可是全家人总是对我不信任怀有疑心。只要电视一播有关国际婚姻的，他们坐在一起总要议论一番，说什么朝鲜族女性一获得国籍就逃跑，大都是伪装结婚啦等等。我刚结婚的时候，就象关在监狱里一样，出入都得经由丈夫的同意。我表姐也是嫁到韩国的，她的状况也和我一样。我一个月多说打两次电话，但每次打电话时表姐夫总是在旁边偷听，有时只要表姐在另一个屋子他就说人不在等。我虽然没有行动自由，经济权利也没有。丈夫从来也不给我固定的生活费用，如果到市场买菜，什么豆芽500元，豆腐1千元等都得记帐，就连我买化妆品剪头烫头（一年也不过

<sup>①</sup> 贺金瑞 燕继荣. 论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08年第3期.



是烫两次头)都得记帐向丈夫伸手。我想他并不是因为爱而娶我,而是因我廉价,所以才跟我一起过。<sup>①</sup>

**个案:** 嫁到首尔市的金女士说:

我在婆婆家的威望比较高,因为我的丈夫兄妹5个,他是家中的老大,父母都在全罗道农村。我们结婚后生下一个女儿,日子过得比较幸福和美满。因为公婆都在农村种地,所以我每个月都给他们寄一些零用钱,在他们的生日或节假日都买些礼物送给他们。他们在亲戚之间总夸奖我这个儿媳妇如何如何善良,我的丈夫也很满意我的为人处世。但是,我感到意外的是,婆婆竟然对我说,“你出去千万不要说你是朝鲜族,因为从你的表面上看,语言、打扮都跟韩国人一样,一点也看不出你是一个外国人。如果人家知道你是外国人会歧视你的,一定要记住我的话”。婆婆是一个朴实的乡村人,内心也有这种排他性,我感到很不解<sup>②</sup>。

其二、公民身份与入籍也受到区别待遇。作为婚姻移民者即使生下孩子,但如果婚姻期未满两周年,其身份仍是外国居民,处在一个身份与权利无法受到保障的等待期。朝鲜族女性的婚姻移民从结婚到获得韩国国籍,必须经过许多关卡,在等待期间内,许多不确定因素,都会带来潜在的危机。

其三、朝鲜族女性嫁到韩国后,她们同时面对“性别”,“异国”双重问题,其被剥夺的权力反映在:自尊心被伤害、工作权未受保障、买卖婚姻的牺牲品、生活信息的匮乏所带来的不安全感和恐慌等。这些都导致她们处在弱势群体的地位。这些人之所以被认定为“弱势”,并非他们没有生活能力,没有自己的生活目标追求、缺少生活诉求的意义,而是他们处于和所谓“强势群体”的比较之中。

**个案:** 嫁到京畿道安养市孙女士说:

“我嫁到韩国后经常受丈夫的暴力,前几年被他打得做了耳膜修补手术,至今听力不太好,头些日子,他又向我施暴力,我吓得叫了警察,可他对警察说‘这是中国女人’警察气愤地回绝道‘中国人就随便打吗’说着就让我提出离婚。”<sup>③</sup>。

<sup>①</sup> 中国朝鲜族女性访谈录. 韩女士 38岁. 京畿道安养市. 2005年10月25日.

<sup>②</sup> 中国朝鲜族女性访谈录. 金女士 39岁. 首尔市芦原区. 2005年4月14日.

<sup>③</sup> 中国朝鲜族女性访谈录. 孙女士 50岁. 京畿道安养市. 2009年8月28日.

好多朝鲜族女性感到最委屈的就是动不动进行人格侮辱和人身攻击。夫妻一旦发生矛盾就以“滚出去”，“回中国去”。“你不就是看着钱嫁到韩国的吗？”等刻薄的话语刺激你，这种人格侮辱和人身攻击，使很多朝鲜族女性实在忍无可忍。他们蔑视朝鲜族女性的出身、能力，动不动就以“什么都不懂的无知者”进行挖苦。这种双重性的侮辱因为女人的身份和来自经济上落后于韩国的国家。因此，朝鲜族婚姻移民常常对自己的身份非常困惑，我到底是谁？为什么嫁到韩国受到这样的侮辱和歧视，在这种困惑中她们更向往养育自己的国土，希望中国更发展强大。来自于不同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差异的文化冲突及社会的偏见和歧视，她们在情感上很难具有对韩国的国家认同意识。现在婚姻移民女性中要求重新更改韩国国籍的现象逐渐增多，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她们的国家认同意识。

## 五、 民族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之互动

中韩国际婚姻中所出现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之互动，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跨国民族内涵的特殊性。众所周知，朝鲜族是跨国民族。其历史上限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但有一点大家公认，这就是祖先是朝鲜半岛人。中国朝鲜族迁入中国后，在新的生活空间，尽管经历了数百年漫长的岁月，但仍完整地保留了自身所拥有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特征，其生活方式也没有发生大的改观，他们的文化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仍然具有普遍的共性。因此，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韩关系的改善，文化交流的深入，朝鲜族女性对韩国文化有着基本的认同和归属感。追其原因，有如下几点：

首先，从历史上看，朝鲜族迁入中国自明末清初始，但大量迁移是从19世纪中叶以后，主要聚集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地广人稀的东北地区接壤于朝鲜，是清政府的“封地”。1644年清入关，定都北京。清康熙年间为保护“发祥之地”，从原辽东边墙的东部起，到鸭绿江为止设置空旷地带，对其实行封禁政策。所以，这一地区无论是经济土壤还是文化土壤，都是相当贫瘠的。而这一封禁地区大部分为未开发的处女地，参貂果木丰实，土地肥沃，对穷困百姓来说，其诱惑无穷。尤其朝鲜人趁乾隆末年弛禁的机会，从单纯的采集、狩猎，发展到在江北耕作土地。并且作为中国之主体民族的汉民族的“闯关东”行为，也是以相同的动机、相同的时间，几乎和朝鲜族的迁移是同时进行的。他们所来到东北地区，不仅生存空间十分宽广，自然资源也很丰富。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和减少了不同民族之间可能发生的生存磨擦，互不干扰各自安居乐业。

其二，清朝与朝鲜朝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及络绎不绝的人员流动，使朝鲜族移民从血缘关系、人缘关系、地缘关系上都没有中断两国间的联系。从“朝出暮归”、“春来秋去”到渐渐地定居生活，自由地走动，不断地传递，不断地交流，使他们对本国的消息了如指掌。加上1885年清政府把图们江以北长约700里，宽约40-50里的地区作为朝鲜人的专垦区，其条件优越于汉民。这就从客观上给朝鲜移民提供了一个空间。这种聚集生活象一个磁场紧紧地把他们吸附在一起，这些都从客观上为朝鲜族固有的传统文化能够得以保存创造了条件。

其三，朝鲜族迁移中国的原因因时期而异。明清之交，1619年明、清之间展开萨尔浒之战，朝鲜应明朝的要求，派援兵参战，其战俘一部分遭到后金的杀害，一部分被发配到辽东各地。1627年、1636年，后金相继两次发动对朝鲜的军事征讨，抓来众多朝鲜战俘，其中大部分留在后金；19世纪中叶朝鲜北部连年发生灾荒，1910年以后是为了在东北建立反日基地，1931年“9.18”事变以后因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制移民政策，朝鲜的农民以集团性的形式迁移中国东北。但无论哪种迁移原因及方式，其根本点决不是对祖国和民族的背叛。朝鲜族作为迁移民族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其忧国怀乡意识非常浓厚。而这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浓厚的忧国怀乡意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负罪感自然地成为他们固守自己传统文化的动力，从而更加珍惜新的共同体的生活。

其四，从中国与朝鲜半岛文化的历史联系来看，中国和朝鲜半岛同属于东亚文化圈。中

国文化对朝鲜半岛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曾产生过巨大影响。两国文化所具有的共同点和友好交流的传统,使朝鲜族没有感觉到文化上的异质感。1910年“日韩合并”后,一些反日志士来中国开展反日独立运动,尤其是1931年“9.18”事变之后,共同的民族命运和历史责任,使他们结成了反日统一战线,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尊重,团结合作,共同抗敌的精神集合体。这不仅有助于避免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反过来为文化涵化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其五、尽管儒家文化产生于中国,但流传到朝鲜以后便发展成为国家的基本统治理念。但由于“日韩合并”后,日帝所实施的民族文化扼杀政策,使朝鲜族非但没有形成趋向现代的新的价值体系,反而走上了固守传统价值观念的文化保守主义的道路。这种价值心态使朝鲜族移居中国后和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相接触时,并没有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来改造自己的传统文化价值意识。也就是说,早期朝鲜族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从文化融合或价值意识的建构意义上为出发点的,而是作为指导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的思想武器来接受的<sup>①</sup>。

总而言之,朝鲜族虽然流落在异国他乡,其文化表层上也出现了一些变化,但其生活方式和价值伦理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朝鲜族社会里,每一个成员对自身民族的传统文化几乎都有一种积极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传统文化能够给这些流落在异国他乡的人们以最后的“文化支援”和精神上的寄托。传统文化不仅是他们依赖的心灵之“家”,同时也是凝聚朝鲜半岛和朝鲜族感情的纽带。这一时期的朝鲜族文化可以说是朝鲜半岛文化向新的生存空间的“文化移植”,他们所带来的“种子”尽管在不同的生态和社会环境下,成长发育的“形态”有些不同,但“内质”是相同的。面对自己所熟悉的文化环境,朝鲜族先民们依旧遵循原有的伦理价值和道德规范。而面对新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他们又与时俱进去创造和适应新的伦理规范。

中韩关系解冻后,人员流动、文化交流非常频繁。半个世纪以来所断绝的韩国文化,唤起了中国朝鲜族对传统文化的向往,因此,与韩国男性接触和交往时,一见如故,产生共鸣。正如一首“阿里郎”能把世界各地殊不相识的朝鲜民族凝聚在一起,这就是民族认同意识,是民族自我归属心理,每一个民族的成员都自觉到他们属于一个民族。民族认同意识是以民族特征、特点为基础和标准的一种心理。以一定的民族共同特征、特点作为一种标准,民族成员对民族整体有认同感。民族这一成员和那一成员之间也有认同心理。在民族认同意识的作用下,民族产生向心力、内聚力以及民族成员之间或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互助性。民族认同意识使遥远相隔的民族成员相遇时一见如故。

当然,从文化出发,人们在具体认定民族时的依据也不是很一致,有的强调社会群体的主观归属感,有的强调群体划分的客观标准,有的则采取了折衷的立场。但不论怎样,朝鲜族女性与韩国男性间的熟知感就是来自这种民族认同意识。

但是,这种民族认同意识,又常常因为跨国民族的“异质性”而发生变化。因为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永远一成不变,文化变迁,变异,是永恒的主题。朝鲜族迁入中国,经历了与韩国完全不同的历史、社会、经济环境,使自身的民族文化发生了变异,形成了与韩国文化具有相似性和共同性而政治上具有异质性的文化特征,成为“同源异流”的跨国民族。朝鲜族女性在中韩国际婚姻中的民族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之互动,就是人们根据不同的情境所派生的多重认同,表现了跨国民族的复杂心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共存于个人的观念和意识中,是个人多重认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往往依据不同的情境,强调或突出某一种认同,这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在特定场合或情境下只强调或突出一种认同,并不等于用一种认同取代另一种认同,也不意味着另一种认同的消失<sup>②</sup>。只

<sup>①</sup> 参照孙春日主编. 中国朝鲜族社会文化发展史. 延边教育出版社. 2002年.

<sup>②</sup> 钱雪梅:《从认同的基本特性看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民族研究》2006年第六期。

有在极端的情况下，才会使人只剩下一种身份，其他身份失去其意义。

一般情况下，我们对于身份认同的情境性选择，主要根据我们的接触对象、我们与对方进行交往的模式及对这一交往的预期。我们一般有两种认同倾向：一是强调与对方的共性，二是突出于对方的差异。如果意欲强调与对方的共性，就能包含对方的一个群体作为认同对象，反之，想标明自己与对方的差异，就会寻找一个把对方排斥在外的身份。由于朝鲜族女性对共同血缘和文化上的认同，他们将韩国作为自己曾经的故国去感知，民族认同非常强烈，在缔结中韩国际婚姻时国家认同比较模糊，但随着不同人群之间的交往所表现出来的异质性的增强，国家认同反而逐渐明朗起来。她们面临多重身份认同，表现出比较复杂的心理。尤其是成为韩国公民后，这种国家公民的身份并没有给她们提供任何庇护，尤其韩国社会对朝鲜族女性的“污名化”的标签印象，使她们处在社会的边缘化，但无论各自情境如何她们的国家认同意识很强烈，更关心中国的发展和家乡的建设。

## 六、 结束语

从中韩国际婚姻中的民族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互动，我们可以了解到跨国民族内涵的复杂性，其本身内部互动问题，与一般的族际互动关系是不同的。首先，跨国民族族群互动是同一文化民族内部之间的不同文化的接触和交往问题。其次，跨国民族内部之间没有民族文化界限，但却有不可逾越的国家政治文化界限，而一般族际之间，民族文化界线是必然的，但未必存在着不同的国家政治文化界限。其三，跨国民族的认同依据不同的情境，其表现复杂多样，其情境的选择与交往对象、交往模式及预期相关。其四，在特定的情境下，突出或强调某一种认同，并不等于用一种认同取代另一种认同，更不意味着另一种认同的消失。因此，我们通过中韩国际婚姻中的民族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之互动，探索跨国民族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特点和规律，以促进母国与所在国的地缘合作，睦邻关系和友好交往为目的，以沟通双方联系、消除隔阂与误会为己任，使朝鲜族婚姻移民成为维系“和平跨居”的双方国家的纽带。这不仅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和而不同”的和谐社会环境的建构，而且也有利于世界各跨国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